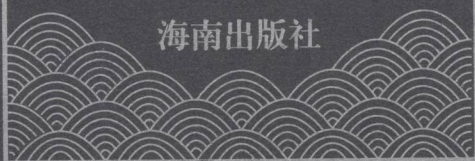


海南地方志丛刊
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

康熙 文昌县志

(清) 马日炳纂修

海南出版社



海南地方志丛刊
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

主 编 洪寿祥
执行主编 周伟民

康熙文昌县志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熙文昌县志/(清)马日炳纂修;赖青寿,颜艳红
点校.-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1
(海南地方志丛刊)
ISBN 7-5443-0557-0

I.康... II.①马... ②赖... ③颜... III.文昌县
-地方志-康熙(1662~1722) IV.K29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234 号

康熙文昌县志

赖青寿 颜艳红 点校

责任编辑:袁大川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196 千

ISBN7-5443-0557-0/K·69

定价:29.80 元

总 序

洪寿祥

《海南地方志丛刊》是一部侧重于古、近代海南历史的大型原始资料总集,在对海南旧地方志进行挖掘、抢救和广泛征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编纂而成。其中一些资料也延伸涉及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海南的政治经济状况。

海南于汉代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开置朱崖、儋耳二郡,正式纳入国家版图。海南有地方志,始于晋代盖泓纂《珠崖传》1 卷;这部著作后来散佚,盖泓始末未详。隋、唐二代,海南复郡,但没有志书;到宋代才有《琼管志》、《琼州图经》等方志,但都没有传世。现在能见到的,仅是《永乐大典》中所存留的若干项资料。元代蔡微所纂《琼海方輿志》也早已失传。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方志资料是王佐纂于明正德六年(公元 1511 年)的《琼台外纪》,这些资料部分保留在唐胄的《琼台志》中。以后,府志、县志等亦多有散佚。本丛刊辑录了至今所能觅得的自宋代《海外四州·琼州》以下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州志、府志、县志、乡土志、采访录以及南海诸岛若干历史资料共 70 多

种,正史中涉及海南的地方志资料及8种《广东通志》中的琼州府部分也列入。

入编的海南地方志,内容十分庞杂。每一种完备的志书,都是地方历史与人文地理、地域政治的综合体;叙述一地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人物并兼及地理环境、天然资源、自然现象,进而分析该地区的历史演变过程,展示该地区的社会、人文面貌,大体都包括舆图、沿革、疆域、气象、山川、名胜、建置、职官、科第、学校、户口、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祥等项。颇具规模的地方志,有着地域性的百科全书的性质;如果把本丛刊所收入的志书联系起来,作为地方志的景观,综合进行观察,它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

关于学术研究价值。传统的地方志,是某个地域的古今总览,“一方之全史”,以当时人、当地人,根据当地的档册、案牍、函札、碑碣等资料,修当地的历史;就史实而言,最为切近当地的真实情况,所谓“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章实斋《答甄秀才修志第一书》)。地方志是当地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在历史学家的史学著作中,十分重视正史;正史的资料常常被作为主证而征引。但正史常有缺憾。比如,正史中的《食货志》论赋税,《地理志》记户口,前者只记条例及重要史事,后者除地理沿革外,户口

也只能记录约数;而地方志记户口、赋税则有详细的数字、类别,并分析其中增减的原因。正德《琼台志》详细记录了自西汉至元代海南岛的户口,还将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的数字排列成表;各县的资料尤为详尽,分别记载了当时汉族、黎族的户口和田地,最后一次的记录还细分男、妇、军民、杂役。这些历史资料,对研究汉族的移民和黎族的概况,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是正史所缺少的宝贵资料。也正因为地方志是由当地人采访、编辑的,资料准确,所以还常常可以用以考订正史的错误,填补自然现象等科技资料记载的空白,并从中搜集和钩寻某一地域的人物事迹、艺文作品、宗教、碑刻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等方面的珍贵史料。而这类史料,是研究海南岛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科技、民族关系、宗教信仰及风土民情等诸多领域可信度很高的资料,一般史书没有记载,学术价值极大!

关于文献学价值。据目录学者的统计,历史上存在过的海南的地方志,除了南海诸岛的志书外,计有:唐代李吉甫修的元和《郡县图志·琼州》等地理志4种、元代孛兰胎修的《大元一统志·琼州》等一统志5种,明代戴璟修《广东通志初稿·琼州府》等通志8种,宋人纂修由义太初作序的《琼管志》等府志11种,元代蔡微纂的《琼海方輿志》等州县志75种,清代张廷标编纂的《琼山乡土志》等

乡土志 3 种,民国许朝瑞采辑的《临高采访录》采访册 1 种,明代王佐撰《琼台外纪》等外纪 3 种,晋代盖泓纂《珠崖传》等传录 3 种,以及宋人纂《琼州图经》等图经 5 种,合计有 118 种。以上数字,如果以修志朝代作一统计,则是晋、唐二代不到 2%,宋代 9%,元代 3%,明代 22%,清代 57%,民国 7%,另有不到 2% 年代不详。本丛刊将至今仍旧存在并且经多方搜辑尚能获得的宋、明、清及民国四代的方志以及部分南海诸岛的志书 70 余种保留下来,大体上构成了海南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比较完整的方志体系,比较清晰地显露从宋代到民国方志文献的轮廓。经过专家们的整理、点校,现在重新印出来,应当说这是保存这些存没系于一线的古方志的最稳妥可靠的方法。否则,若不再加抢救,使之继续亡佚,将来会后悔莫及,实际上是对后人、对历史的一种不负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将这四代的方志,有手稿本、原刻本、重(补)刊本、抄本、传抄本、石印本、铅印本、油印本等不同版本重加汇集编印,在文献学上无疑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也是泽被后人的重大举措。

关于现实意义。这套丛刊的编印,既是为了系统地整理海南的历史文献,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我们今天的需要。比方说,要维护我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从海南地方史志资料中可以举出无可辩驳的证据。早在汉代,中国

人民就在南海(古称涨海)的航行和生产实践中先后发现了南海诸岛。东汉时,杨孚《异物志》一书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三国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讲到汉代从马来半岛的陆地到中国内陆的航程时,对南海诸岛地形地貌特征曾作如下记述:“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见宋代李方《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四夷部十一“勾稚国”)文中所说的“崎头”,就是我国古代人民对海中礁屿、沙滩的称呼;所谓“磁石”,指的是古代航行南海的船只遇到礁滩而搁浅,就好像被磁石吸住一样。杨孚的记载,是公元1世纪时对南海诸岛第一手材料的记述,是十分珍贵的史料。但杨孚的《异物志》原书早已失传,而本丛刊汇纂的正德《琼台志》在卷九《土产》条下加以转引,得以保存下来,为今天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提供了最早的可靠证据。

又如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省而言,海南地方志资料能够为我们提供历史考察的线索,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海南岛是天然的人类生存发展试验示范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物种多样性。包括现在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20多种珍稀树木和100多种野生动物,在古方志中多有记载。有些农作物、果品及水产品,今天如果加以提纯复壮,对于发展有海南特色的热带高效农业和海洋产业,或许有所帮助。旅游业作为海南

省的支柱产业之一,如果利用方志中所提供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素材,重新给予阐释,这将有助于发掘海南旅游的文化内涵,增强海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作为海南岛古代的精神文化遗产,这套丛书的内容,就如恩格斯在论述文化遗产时所指出过的,它是一种“思想材料”,是古代海南官府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这对于我们研究海南的历史,挖掘海南文化的厚重内蕴,以及对祖籍海南的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今天以现代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来阐明海南传统文化在 21 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这套丛书将也有助于我们把海南建设成为“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美好家园。

还必须指出,既然是文化遗产,在内容上自然有二重性,我们今天应该意识到其中的“糟粕”,诸如封建等级观念、封建节孝观念,以及民族歧视政策,等等。志书中对黎族人民的错误表述,是封建统治者民族政策的陈迹。回顾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民族压迫,我们越发感受到今天民族大团结的温暖和可贵!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我们在研究工作中,使用地方志的材料时,要特别注意将这些记录同正史与家谱、族谱互相参照,认真分析,弃偏信而生正见。譬如说,从西汉到

隋代,关于海南岛设郡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汉书》记载,汉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罢弃珠崖郡,这以后海南岛上就没有设立过代表中央政权的郡治,治所都设在海北,一直到隋朝大业六年重置珠崖郡,郡治才在海南岛上,上距汉元帝罢弃珠崖郡已经656年。对于这段历史,只有明代的王佐在《琼台外纪》里曾经正确指出,两汉朱卢(珠崖)县、吴时的珠崖郡应在海北的雷州一带,“珠崖自汉元之弃至梁大同凡五百八十年,而后内属”。王佐《琼台外纪》这一接近正确的判断,在海南《冯氏族谱》中得到了外印证。隋朝时海南之所以能够重新归入中央版图,就是由于冼夫人的感召。海南冯氏族谱当中列出的世系表,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大明一统志·琼州府》、正德《琼台志》、《大清一统志·琼州府》都在沿革表里将两汉的朱卢、朱崖县和六朝的朱卢县列入琼山县一格,并且在《琼州府建置沿革》下将明见于《汉书》的初元三年罢弃珠崖郡,擅改为“初元三年省珠崖郡入合浦,后汉仍属合浦郡”。又在琼山县下说:“汉初为珠崖郡地,后置朱卢县属合浦郡,后汉曰珠崖县。”在《古迹》珠崖故郡下说:“《地理志》合浦郡领朱卢县,为都尉治,盖即故珠崖郡所置。”此后,该说为人所信,都认为朱卢(朱崖)县相当琼州一府、今海南全岛。这段史实的错误,被清代不少方志所沿袭。影响所及,当代涉及这一史实的

论述,也有脱不开其窠臼,重复了上述志书的错误。

现在,我们将征集到的志书,进行甄别、筛选、整理,重新点校,并用简体字印出,以便于当代读者的阅读和研究。编成和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实在不容易!版本的拣择,书品的选用,残缺的处理,书页破旧而文字漫漶的识别,乃至编辑加工和版式设计等等,都需要付出一番功力,常常还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例如,一些单位对文化资源共享缺乏应有的大度,致使《崖州直隶州乡土志》难以征获,稍留遗憾!当然,我们也对征集到手的某些无可稽考的“小志”,经过认真而审慎的研究,决定不录。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自2000年起就把海南地方文献的整理,作为海南省跨世纪重点文化工程,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切实的扶持。编纂委员会的目标,是希望做得尽量好一些,完善一些。尽管编委会成员以及参加点校的同仁兢兢业业地工作,临深履薄,夙兴夜寐,以期无负于当年的编纂者、收藏者,无负于今天广大读者以及国内外学术文化界,无负于高明来哲,但是,限于编纂委员会的水准和我们所能具有的条件,丛书中的差错一定还有,谨以诚挚的心情,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前 言

康熙《文昌县志》，清·文昌知县马日炳^①镶红旗奉天人，监生，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 1709 年）任修，教谕朱顺昌广东南海人，拔贡、训导伍瑞广东新会人，岁贡纂。又有校阅、编辑人员若干均为文昌籍贡生、生员，实际承当了修志工作中的编纂和采访等事务。该志凡 10 卷，分 10 门志，总计 81 目^①，有图、首刊序、修志姓氏、目录、凡例 14 条。继则一卷一志，分列疆域、建置、赋役、学校、兵防、秩官、人物、海黎、杂志、艺文等志。叙事时间断限为清康熙五十七年公元 1718 年。

文昌有县志，始于明代。据康熙《文昌县志》卷首所附的修志姓氏，可知邑志最早是由明嘉靖年间公元 1522～1566 年本县教谕李遇春广西宜山人、训导叶懋广东南海人等人纂修。明崇祯年间公元 1628～1644 年，知县周廷凤四川广元人，孝廉、学谕林梦楨福建人，举人续修。清康熙元年公元 1662 年，知县邓生柏广西全州举人、训导吴廷缙广东肇庆高要贡生三修。康熙九年公元 1670 年，知县沈彰浙江归安进士、学训欧阳敬广

① 据点校整理本的实际目录计算。如按康熙《文昌县志》卷前原附的《文昌县志总目录》计，则为 82 目。但《文昌县志总目录》所载的目次，与该志正文略有不合之处（说详点校整理本中的相关校记）。

东肇庆四会岁贡四修。康熙二十七年公元 1688 年,知县何斌浙江仁和人、教谕郭炳如广东番禺人、训导毛翊广东东莞人五修。清康熙年间前后四修县志含康熙《文昌县志》,可谓盛举。这既与当时所谓“盛世修志”的总的背景有关,更有文昌地区社会、经济繁荣进步的内在原因。以上五次县志纂修工作,虽属草创,且不乏“繁杂”、“俚鄙”等弊病^①,但为后人续修、新编邑志,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康熙五十七年公元 1718 年,马日炳在上述旧志的基础上,主持增订邑志,也就是刻下所见到的这部康熙《文昌县志》。康熙《文昌县志》与以往前后五修的邑志相比较而言,体例严谨,编纂精核,为文昌最具代表性的志书。因此,该志成书并刊刻之后,上述五种旧志便陆续亡佚^②,康熙《文昌县志》便成了目前瀛寰之间所能见到的本县最早的方志。

本志于清康熙五十七年初刻县署刻本,计 4 册,25 公分,线装,后曾翻刻。现存有清乾隆年间公元 1736~1795 年印本。北京故宫博物院、浙江图书馆和台北故宫等少数图书收藏机构分藏有原刻本及抄本。流传欠广,梓本罕见。中

① 清·沈影《旧志序》。

② 明嘉靖《志》亡佚较早,似入清后已不见,故清初邑志的编纂者在志序中屡见称“新、旧周(廷凤)、邓(生柏)二编”,而不及于嘉靖旧本。清·阮元《广东通志》卷 192《艺文略》称该志“佚”。另,周(廷凤)《志》、邓(生柏)《志》、沈(影)《志》、何(斌)《志》4 种,清·阮元《广东通志》卷 192《艺文略》并称“佚”或“未见”。

中国大陆地区影印故宫珍本问世底本为乾隆年间刻本，方广其流传。本次点校整理工作即以故宫珍本丛刊本为底本。

康熙《文昌县志》以康熙二十七年何斌《志》为底本，“凡二十七年以后未及志而应入志者”，“互相考订，求其确有据，援就班按部，增入卷末，以补前人所未逮”^①。本志并非应景之作、草率成编；编纂工作筹备井然。编纂之先，定有较完备的体例^②，纲举而目张；在编纂过程中，定稿比较严谨，故言简而事核。本志卷帙、页数虽少，但涉及文昌方方面面的内容。资料既来自本县档册、采访录，又广事旁搜有关文献，不失是一部较充实的“地方性的百科全书”。

因阅年久远，今故宫珍本丛刊本康熙《文昌县志》存在泐残、阙页等问题。某些泐残及阙页之处，幸有继后的咸丰《文昌县志》等文献，可以大致为之补足；但也有泐残、阙页者则已经不能恢复其原貌。除此之外，底本中还存在某些疏误，主要是讹错、误脱、字衍等。底本因属乾隆年间翻刻，故存在避讳而回改旧文的情况，如据清雍正间讳例改“祜”为“正”，据乾隆间讳例改“弘”作“宏”译下，以至于一些人名不得不借助刊刻于此前的其他文献，才

① 清·马日炳《增订文昌县志序》。

② 参见清·马日炳《增订邑志凡例》。

能获其真貌。底本刻工欠佳,某些字形相近的字,往往在镂刻时不作分别,需要分析前后文义才能断明。个别文字,枣鐫时已欠清晰,故据今底本,已难定夺。

本次点校整理工作,对底本中的疏误之处,予以尽可能详尽的校正。点校整理依照以下凡例进行:

一、点校整理均依照原文,加以新式标点。

二、在点校整理过程中,取咸丰《文昌县志》等文献与本志相互比对,并做必要的校注。

三、凡底本原文泐残不清者,采取以下三种方式处理:

(一)凡不能确定为何字者,则以“□”号表示。如其文尚仿佛可辨大致为某字,则加注说明。

(二)如与咸丰《文昌县志》篇目内容相同而文字缺漏者,则据咸丰《文昌县志》补足。所补文字,前后例加“[]”符号注明。

(三)凡不能确知泐残多少字,则前后加“【 】”符号,标明如“下阙数字”等。

四、底本存在因避讳而改、省字的情况。正文中屡见改“祜”为“正”,改“弘”为“宏”。查讳例,改“祜”为“正”,是避清世宗(雍正)爱新觉罗胤禛之讳;改“弘”为“宏”,是避清高宗(乾隆)爱新觉罗弘历之讳。据此,可知本志虽然定稿于清康熙年间,但今所见本,应是清乾隆年间再付

梓刊刻,也因此才存在上述两种因避讳而回改原刊之举。

点校整理时,凡“崇祯”作“崇正”、“祯祥”作“正祥”等,今俱正作“祯”字。又,“王弘海”作“王宏海”,或阙作“王海”;“弘治”改作“宏治”。今均正之。

五、对异体、俗体、别体字的处理,遵照新版《辞海》进行。

王君伟先生参与了本书的审订工作。

目 录

前言	(1)
增订文昌县志序	马日炳(1)
旧志序	沈影(2)
旧志序	何斌(3)
增订邑志姓氏	(5)
旧志原本姓氏	(6)
重修姓氏	(6)
三修姓氏(未刻)	(7)
四修姓氏	(7)
五修姓氏	(8)
增订邑志凡例	(9)
卷一 疆域志	(13)
輿图(14) 沿革(14) 星野(22) 气候 风候、潮	
候附(23) 地理(24) 形胜(25) 山川 井泉附(25)	
乡都(33) 风俗(34) 节序(34)	
卷二 建置志	(37)
城池(37) 公署 铺舍附(39) 坛庙 庵、祠附(43)	